

语料库话语分析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应用

谷孟雪*, 张瑞华

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4日

摘要

区域国别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 其学科建设与方法论创新备受学界关注。本文将语料库话语分析应用于区域国别研究, 提出“四步法”研究框架, 并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媒体关于“孝道”的话语为例, 考察其搭配词、关键词和词语索引, 从而揭示两国“孝道”话语建构的差异及其深层社会文化根源。研究发现, 新加坡“孝道”话语呈现出国家主导、治理导向的鲜明现代化特征; 而马来西亚“孝道”话语则体现出社会倡导、文化传承与民间践行的本土特色。研究表明, 两国“孝道”话语建构的分野, 本质上是两国不同国家历史进程、国家治理模式与文化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表明语料库话语分析可以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

关键词

区域国别研究, 语料库话语分析, 孝道

Application of Corpus-Based Discourse Analysis in Area Studies

Mengxue Gu*, Ruihua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anjin

Received: June 21, 2026; accepted: July 15, 2026; published: July 24, 2026

Abstract

Area Studies, as an emerging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has attracted significant academic attention for its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s. This study applies corpus-based discourse analysis to Area Studies and proposes a four-step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collocates and concordances, it reveal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ilial piety” in news discourse betwee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nd their underlying sociocultural roots. The findings indicate

*通讯作者。

that Singapore's "filial piety" discourse exhibits a distinctive modernization feature of being state-led and governance-oriented. In contrast, Malaysia's "filial piety" discourse reflects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advocacy,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grassroots practic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divergence in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filial piety" is essentially the result of the interplay of their different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state governance models, and cultural contexts. It shows that corpus-based discourse analysis can offer a viable approach for Area Studies.

Keywords

Area Studies, Corpus-Based Discourse Analysis, Filial Pie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作为新兴交叉学科, 区域国别学聚焦特定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领域的现象及其规律[1], 旨在为国家制定宏观政策、应对复杂紧迫国际问题提供学术支持[1], 其学科建设与方法论创新备受学界关注。与此同时, 我国外语学科历经多年发展, 在语言资源、文本分析、跨文化理解等方面积累了独特优势, 如何推动外语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深度融合、拓展研究范式、提升研究的实证性与科学性, 成为当前学者共同探索的重要议题。蔡基刚(2025)明确提出, 外语学科可依托自身优势, 通过对特定时期某一主题的政治演讲、政府报告和新闻报道来建立语料库开展研究[2]。

目前, 囿于传统研究方法的思维定式, 区域国别研究水平与国家战略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其主要短板在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不足[3], 而语料库话语分析以真实语言数据为基础, 依托计算机技术实现大规模文本的标准化处理、量化分析与深度挖掘, 能够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坚实的方法论支撑, 对于丰富区域国别研究具有重要价值[4]。在此背景下, 将语料库话语分析融入区域国别研究, 既是外语学科服务国家战略、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 也是区域国别研究创新研究方法、走向数字化与实证化的必然选择。基于此, 本文重点探讨语料库话语分析应用于区域国别研究的现实可行性和具体研究框架, 以期对两大领域的交叉融合与学术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2. 语料库话语分析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适用性

“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对世界各国、各地区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和探讨, 帮助国人了解世界, 为国家制定政策和开展各类涉外工作提供学术和智识支撑[5], 这就要求研究者深入理解对象区域和国别在经济、安全、社会、技术、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以及他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6]。然而, 传统区域国别研究常因单一学科视角的制约, 表现出研究视野狭窄、静态与动态分析脱节、全球视角和比较分析欠缺、非传统安全问题受关注度低、数据和方法使用存在局限等问题[7]。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作为当代语言学与计算机科学交叉融合形成的新兴学科, 恰好能够为这一研究提供适配的技术与方法支撑, 其核心是借助计算机手段对巨量的语言文字资源库(又称语料库, corpus 或 corpora)进行高速检索、统计和展示, 以揭示真实语言使用的倾向性规律及其所传递的意义、功能乃至思想意识[8]。正如 John Sinclair 所言, “当你一次性关注到大批量的语言事实时, 你对语言的看法会大有不同”[8], 语料库话语分析正好可以为区域国别研究中海量、多类型的文本数据处理提供一条科学、高效的分析路径: 一方面, 其依托标准化的建库与分析流程, 对文本进行系统化检索、统计与语义挖掘, 实现对跨区域、跨文本语言规律的精准

捕捉; 另一方面, 语料库话语分析能借助技术手段突破人工分析的规模限制与主观局限, 挖掘出人工阅读难以察觉的主题特征、隐性关联、话语倾向与语义特征, 为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度分析提供可靠支撑, 助力研究者更全面、客观地解读对象国家与地区的社会文化、政治立场及思想动态。

当前已有多项实证研究印证了语料库话语分析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例如, 曾建松、李奇明(2023)以斯里兰卡媒体涉湘报道为语料, 借助语料库与批评话语分析方法, 有效呈现区域国别经济文化互动中的地方形象建构特征[9]; 李德凤、吴侃(2024)通过构建中美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报道的专用语料库, 运用主题建模技术精准揭示不同国家媒体的话语偏向与政策立场[4]; 杨梅、李杰(2026)则利用LDA、AntConc等语料库工具开展跨国学术话语比较, 清晰识别不同区域学者的认知差异与话语模式[10]。这些研究从媒体话语、区域形象、国际学术传播等维度充分证明, 语料库话语分析能够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客观、系统、可量化的分析路径, 进一步夯实了语料库话语分析应用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可行性。

3. 语料库话语分析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研究框架

语料库话语分析实现了量化分析与质性阐释的结合, 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与分析视角。将语料库话语分析应用于区域国别研究, 需遵循科学、系统的研究框架, 基于此, 本文提出适用于区域国别研究的语料库“四步法”研究框架, 具体分为以下四个步骤(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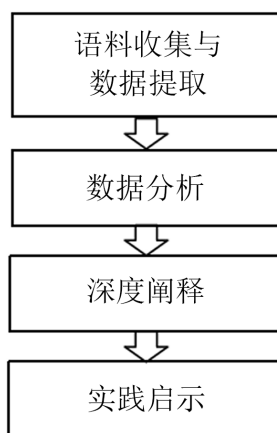


Figure 1. “Four-step” research framework

图1. “四步法”研究框架

第一步为语料收集与数据提取。首先, 根据研究问题收集所需语料, 并对语料进行预处理, 包括文本清洗、分词、词形还原、词性标注及元数据标注等, 确保语料的规范性与可用性; 然后, 将处理好的语料导入 AntConc、WordSmith Tools 等语料库分析软件, 提取数据。

若研究可依托线上已有的成熟语料库, 且该语料库符合研究要求, 则可直接利用线上语料库提取数据。

第二步为数据分析。对提取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 重点挖掘人工难以察觉的语言模式与话语规律, 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搭配词分析、语义韵分析、主题分析、情感与立场分析等, 通过量化数据客观地呈现区域国别话语的特征。

第三步为深度阐释。量化分析结果仅能呈现话语的规律与倾向性, 无法揭示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 因此需将量化分析得出的语言模式、数据特征, 置于特定区域或国家的历史文化语境、政治制度背景、社会发展现状中进行深度解读。

第四步为实践启示。立足前文研究结论与区域国别语境阐释, 阐明研究成果对区域国别研究相关议

题的借鉴意义与现实导向, 实现学术分析向区域国别研究实践应用的价值升华。

4. 语料库话语分析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实践应用

4.1. 语料收集与数据提取

基于上述“四步法”研究框架, 本节将运用语料库方法分析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国家的媒体对“孝道(filial piety)”的报道, 考察两国媒体中“孝道”的话语特征及跨国差异, 并探讨话语差异背后所反映的文化价值、社会伦理与国家文化特征。因此, 研究需要满足多国别、同体裁、可检索、可对比的媒体文本条件。网络新闻语料库 NOW (News on the Web)收录了 2010 年至今 20 个国家和地区主流媒体发布的英语网络新闻[11], 支持按国家进行精准检索与量化分析, 能够为跨国媒体话语比较提供统一、规范、可靠的数据基础, 可满足本文的研究需求。因此, 本文选取 NOW 语料库作为数据来源, 考察两国媒体中“孝道”的话语特征与差异。本文首先利用 NOW 语料库的 Collocate 功能, 以 filial piety 为节点词, 将搭配词词性分别限制为动词、名词, 跨距设定为+5/-5, 分别提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媒体话语中前 15 位搭配动词和名词。然后, 利用 NOW 语料库的 Texts/Virtual 功能, 以 filial piety 为节点词, 分别将语料来源限制为 Singapore 和 Malaysia, 构建新加坡、马来西亚“孝道”主题虚拟语料库, 根据关键性 (Specific/Keyness 值)提取两国关于“孝道”的前 15 位关键词, 并以 NOW 通用库作为参照语料库, 考察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孝道”话语的独特主题。

4.2. 数据分析

4.2.1. 搭配词分析

经检视搭配词及其相关的词语索引, 本文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媒体话语中 filial piety 的前 15 位搭配动和名词进行分类, 结果见表 1。

如表 1 所示,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的“孝道”话语均围绕价值伦理和实践践行两大维度展开, 但侧重有所不同。动词搭配层面, 新加坡话语中情感认知类动词“want (想要)”“feel (感觉)”、陈述阐释类动词“said (说)”“mean (意味着)”和行为实践类动词“show (展示)”“give (给)”“honouring (尊敬)”既具象化了“孝道”从内在情感到外在行为的实践路径, 如“feel a strong sense of filial piety (具有强烈的孝道意识)”“give their parents a generous allowance (给父母丰厚的赡养费)”, 也承载了多元主体对“孝道”内涵的界定、争议与价值传递, 如“this does not mean that filial piety is being eroded in our society (这并不意味着孝道在我们的社会中正在被侵蚀)”。在马来西亚话语中, 行为实践类动词“show (表达)”“perform (践行)”“cover (承担)”“try (尽力)”“addressing (满足)”“coming (返回)”和陈述阐释类动词“show (表明)”“said (说)”, 则呈现出社会文化与个体实践相融合的特征。在名词搭配层面, 两国均以家庭代际和价值伦理类名词为核心, 高频出现“family (家庭)”“parents (父母)”“children (子女)”“values (价值观)”“culture (文化)”“virtue (美德)”“value (价值)”“concept (观念)”等词汇, 凸显了两国“孝道”话语均以家庭为基础单元、以代际关系为核心载体, 强调“孝道”作为传统美德与文化价值的核心定位以及敬老尊长的伦理规范。值得注意的是, 新加坡将“孝道”与全体新加坡民众的社会行为绑定, 强调代际秩序对社会稳定的意义, 如“family values that emphasised filial piety, respect for authority and adherence to social norms dominated everyday life (强调孝道、尊重权威和遵守社会规范的家庭价值观主导了日常生活)”; 而马来西亚的“孝道”则被视为华人社群共享的文化规范与集体价值, 具有较强的族群属性与民间基础, 强调对家族、对祖先的缅怀与传承, 如“Sarawak is a beautiful state of people who cherish filial piety (砂拉越是一个美丽的州, 这里的人民珍视孝道)”“practising filial piety toward ancestors and family members who have passed away (向祖先和已故的家人履行孝道)”。

Table 1. Collocates of “filial piety” in Singaporean and Malaysian media**表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媒体中 “filial piety” 的搭配词

国家	主题	词性	类别	搭配词
新加坡	国家主导		倡导宣扬类	encourage (鼓励)、preach (宣扬)、trumpet (宣扬)、emphasised (强调)
		动词	认可规范类	approve (赞成)、established (建立)、communicate (传递)
	社会治理		负面评价类	lacking (缺乏)
		名词	治理保障类	government (政府)、security (保障)
	价值伦理	情感认知类		want (想要)、feel (感觉)
		动词	陈述阐释类	said (说)、mean (意味着)
		名词	家庭代际类	Singaporeans (新加坡民众)、family (家庭)、parents (父母)、children (子女)、age (年龄)、hall ¹ (堂)
			价值伦理类	values (价值观)、culture (文化)、concept (观念)、virtue (美德)、value (价值)、love (爱)、respect (尊重)
	实践践行	动词	行为实践类	show (展示)、give (给)、honouring (尊敬)
	社会倡导	动词	倡导宣扬类	promote (弘扬)、emphasise (强调)、needs (需要)、advocate (倡导)、celebrating (弘扬)
马来西亚	价值伦理	名词	道德教化类	taught (教育)、absorb (吸收)、plant ² (播种)
			陈述阐释类	show ³ (表明)、said (说)
	价值伦理	名词	家庭代际类	family (家庭)、parents (父母)、children (子女)、elders (长辈)、ancestors (祖先)、people (人们)
			价值伦理类	respect (尊重)、values (价值观)、importance (重要性)、culture (文化)、loyalty (忠诚)、virtue (美德)、value (价值)、concept (观念)
	实践践行	动词	行为实践类	show (表达)、perform (践行)、cover (承担)、try (尽力)、addressing (满足)、coming (返回)
		名词	行为认知类	way (方式)

除上述共性之外,新加坡“孝道”话语呈现出鲜明的国家主导、社会治理导向特征。动词搭配上,新加坡将“孝道”与国家治理、社会秩序紧密绑定,其关于“孝道”的话语具有权威性与引导性。倡导宣扬类动词“encourage(鼓励)”“preach(宣扬)”“trumpet(宣扬)”“emphasised(强调)”和认可规范类动词“approve(赞成)”“established(建立)”“communicate(传递)”体现了“孝道”由国家与媒体主动宣传、大力推崇,并

¹新加坡关于 filial piety 的第 11 位搭配名词“show(展示)”仅以名词形式出现 2 次,其他均为动词形式,因此将其剔除,依次将第 16 位搭配名词“hall(堂)”递补进来。

²马来西亚关于 filial piety 的第 10 位搭配动词“become(成为)”均为系动词,本研究只考察实词,因此将其剔除,依次将第 16 位搭配动词“plant(播种)”递补进来。

³搭配动词“show”在语境中按语义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行为实践类,一类是陈述阐释类。

被主流社会合法化、制度化, 成为社会必须遵循的价值准则, 如 “Doesn’t government want to encourage filial piety (难道政府不想鼓励孝道吗)” “More than 400 virtuous and filial piety lists established in urban communities (城市社区中已设立超过 400 个孝贤榜)” “The advertisement is intended to communicate the family values of filial piety (这则广告旨在传达孝道这一家庭价值观)” ; “lacking (缺乏)” 作为负面评价类动词, 体现了新加坡传统家庭伦理与现代养老模式的冲突, 如 “Does sending ageing parents to a nursing home instead of caring for them yourselves equate to lacking filial piety (将年迈父母送入养老院而非自行照料是否等同于缺乏孝道)”, 将现代养老、代际独立等行为建构为 “孝道” 缺失, 既强化了传统 “孝道” 的道德规范, 也凸显了新加坡公共话语中对现代社会变迁可能侵蚀传统 “孝道” 的担忧与批判。在名词搭配上, 治理保障类名词 “government (政府)” “security (保障)” 的高频出现, 表明新加坡的 “孝道” 话语已突破单纯的家庭伦理范畴, 被纳入国家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体系, 如 “Across age groups, filial piety and safety and security for their families were regarded the most important (在各个年龄段中, 孝道以及家人的安全与保障被视为最重要的)”。

与新加坡相比, 马来西亚 “孝道” 话语则体现出社会倡导、文化传承的本土特色。其搭配动词既带有一定的公共宣传色彩, 又强调在教育与社会生活中对 “孝道” 的传承。倡导宣扬类动词较为突出, 包括 “promote (弘扬)” “emphasise (强调)” “needs (需要)” “advocate (倡导)” “celebrating (弘扬)”, 这类动词体现出马来西亚社会对 “孝道” 价值的主动推广与正面强调, 将 “孝道” 视为值得弘扬的文化理念, 具有较为鲜明的社会引导性, 如 “The Group has set the standard of providing high quality services for others to emulate...it has also helped to promote the filial piety culture among the people (该集团不仅树立了高质量服务的典范, 还在民众中弘扬了孝道文化)”; 道德教化类动词 “taught (教育)” “absorb (吸收)” “plant (播种)”, 反映出 “孝道” 被视作一种需要通过教育传递、在文化中内化的观念, 强调其在代际传承与文化熏陶中形成, 如 “must have been taught lessons on filial piety by his school teachers (他一定接受过学校老师关于孝道的教导)” “we plant the seeds of filial piety (我们播下孝道的种子)”。

4.2.2. 关键词分析

本文分别选取了两国前 15 位的关键名词(见表 2), 以探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 “孝道” 话语的独特主题。

由表 2 可见, 新加坡 “孝道” 话语中显著出现 “foreigner (外国人)” 一词, 结合具体语境发现, 相关报道集中围绕外来人口规模管控、住房购置权限、公共资源分配、本地民众的排斥情绪展开, 外来人口在媒体叙事中被建构为与本土民众争夺住房、福利资源的外来 “他者” 形象, 这折射了新加坡城市发展带来的本土公共资源焦虑。另外, “temple (寺庙)” 一词在新加坡 “孝道” 话语中实则侧重于社会治理方面, 如 “I am ready to explain to the residents what the temple have done to minimize noise pollution (我准备向居民解释寺庙已采取哪些措施来尽可能减少噪音污染)”。此外, 新加坡 “孝道” 话语中大量出现 “flat (公寓)” “scholarship (奖学金)” “premium (保险费)” “agenda (议程)” “politician (政客)” “health-care (医疗保健)” “start-up (新兴公司)” 等城市民生、公共福利与国家治理类词汇, 这类词汇体现出新加坡媒体将 “孝道” 纳入国家、社会治理层面, 依托住房、医疗、社会扶持等公共配套展开叙事, 形成独有的国家治理导向式 “孝道” 表达。

马来西亚 “孝道” 话语则聚焦 “father (父亲)” “dad (父亲)” “mother (母亲)” “wife (妻子)” “relative (亲戚)” 等私人亲属称谓, 以及 “folk (普通人)” “parent (父母)” “family (家庭)” “ceremony (仪式)” “generation (一代人)” “face (面子)” 等家庭伦理与文化传承类词汇, 整体将 “孝道” 具象建构为家庭人际相处、亲情表达与本土民俗传承, 呈现出个体化、民间化的本土特征。值得注意的是, “love (爱)” 一词在新加坡话语中多被延伸至国家认同领域, 而在马来西亚媒体中则更多地保留在家庭亲情层面。这也再次证实了两国 “孝道” 话语的差异。

Table 2. Keywords of “filial piety” in Singaporean and Malaysian media**表 2.** 新加坡、马来西亚媒体中 “filial piety” 的关键词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序号	关键词	K 值	序号	关键词	K 值
1	foreigner ⁴	74.3	1	father ⁵	48.3
2	senior	55.8	2	dad	34.4
3	flat	28.4	3	folk	31.1
4	scholarship	21.6	4	parent	29.6
5	premium	21.4	5	relative	25.3
6	parent	16.4	6	wife	25.3
7	agenda	15.2	7	respect	24.6
8	noise	15.1	8	daughter	21.5
9	temple	13.7	9	mother	15.6
10	speech	12.8	10	family	15.1
11	politician	11.2	11	ceremony	12.3
12	health-care	10.7	12	love	8.7
13	start-up	10	13	generation	8.6
14	love	9.4	14	child	8.6
15	father	9.3	15	face	7.9

4.3. 深度阐释

由上述可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关于“孝道”话语的搭配词、关键词呈现出鲜明的文化差异与国别特色，共同折射出不同社会对“孝道”的话语建构。新加坡的“孝道”话语呈现出国家主导、治理导向的现代化公共伦理特征；马来西亚的“孝道”话语则体现出社会倡导、文化传承与民间践行的本土特色，既强调对传统伦理的弘扬与教育内化，又关注其在现实社会中的落地与践行，体现出多元文化背景下家庭伦理与社会价值相结合的话语特点。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在“孝道”话语建构上的分野，本质上是不同国家历史进程、国家治理模式与文化价值体系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历史进程来看，新加坡自独立以来长期面临内忧外患的生存压力，致力于建成“一体多元”思想基础上的、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强的国家[12]，通过国家话语将“孝道”塑造为跨族群的共同伦理，将其纳入社会治理与公民伦理框架，强调秩序、责任与社会凝聚力；而马来西亚是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取得独立之前，多族群社会已经形成[13]，长期族群分隔的历史环境也使得“孝道”更多依附于族群文化传统与宗教伦理。

在国家治理模式层面，新加坡推行务实高效的治理体系，强调新加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12]，“孝道”被转化为可引导、可倡导的公共价值与社会规范，兼具道德教化与社会治理功能；马来西亚则采取坚持“马来人优先”的原则下、倡导各民族共同发展[14]的治理路径，国家较少对“孝道”进行统一价值塑造，“孝道”多为社会倡导、民间践行。

⁴新加坡关于 filial piety 的第 1 位关键词“piety (孝道)”为节点词“filial piety”的一部分，因此将其剔除，从第 2 位“foreigner (外国人)”依次选取 15 位关键词。

⁵同上，从第 2 位“father (父亲)”依次选取 15 位关键词。

在文化价值体系维度,新加坡以实用主义、公民伦理与社会秩序为基底,对传统“孝道”进行现代化改造,使其适配都市核心家庭与多元文化社会;马来西亚则以多元族群的文化共存为基本特征,“孝道”话语深度嵌入不同族群的文化传统与宗教实践[15],成为维系族群认同与延续族群文化传承的纽带。

4.4. 实践启示

本文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孝道”话语为切入点,将语料库话语分析应用于区域国别研究,揭示了“孝道”并非单一不变的传统文化概念,而是内嵌于不同国家政治体制、族群结构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国别化的文化产物。因此,我们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必须置于具体国家的语境之中。在跨文化交际时,我们更需要立足各国国情,秉持差异理解、尊重包容的交际原则,从而实现更顺畅、精准地跨文化沟通与文化互动。

5. 结语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亟需打破学科壁垒,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本文验证了语料库话语分析可以有效推动语言学与区域国别学的交叉与融合,将语言学中的话语分析、语料库技术与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等研究维度有机融合,不仅可以拓展语言学的应用场景,也可丰富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视角与路径。未来,区域国别研究可进一步结合批评话语分析、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等多元理论视角,从权力意识形态、认知隐喻建构、话语交际语境等层面开展多维分析,从而实现微观话语分析与宏观区域解读的有机结合,推动研究向纵深发展。

诚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一,数据来源存在单一性,研究依托 NOW 语料库,仅选取英文新闻媒体语料考察新马两国“孝道”相关话语,未能纳入民间访谈、影视作品等其他语类,难以完整反映民间日常语境下“孝道”话语的真实样貌;其二,研究主要依赖 NOW 语料库的搭配词、关键词及词组索引分析,对文本深层修辞策略和话语互文性的阐释能力有限;其三,研究核心围绕华人文化圈展开分析,对马来西亚等当地其他族群“孝道”观念的讨论较为薄弱。鉴于此,后续研究一方面可扩充语料范畴,对比官方报道、民间访谈等多元语类,同时纳入中文媒体语料开展双语话语对照分析;另一方面可跳出“孝道”这一单一文化概念,将研究框架延伸至家庭伦理、代际观念等相关议题,并把研究对象拓展至东南亚其他多元族群国家,进一步丰富区域国别视域下传统伦理话语的比较研究。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话语分析视角下西方媒体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建构研究”(TJYY23-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谢韬,陈岳,戴长征,等. 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 学科定位、基本内涵与发展路径[J]. 国际论坛, 2022, 24(3): 3-35, 155.
- [2] 蔡基刚. 外语学科开展区域国别研究: 难点、途径与对策[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5(6): 54-61.
- [3] 李杰,陶源. 大数据与区域国别研究范式创新[J]. 山东外语教学, 2024, 45(5): 96-104.
- [4] 李德凤,吴侃. 基于语料库的区域国别研究——以“一带一路”中美主流媒体报道主题建模分析为例[J]. 外语电化教学, 2024(4): 10-17, 24, 102.
- [5] 钱乘旦,姜锋,刘鸿武,等. 再论区域国别学的基本问题[J]. 国际观察, 2024(4): 133-156.
- [6] 冯仲平. 区域国别学的重点是什么? [J]. 区域国别学刊, 2026, 10(2): 11-15, 154.
- [7] 班超,梁国杰.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新视角与新方法——基于跨文化形象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 大连大学学报, 2026, 47(1): 25-32.

-
- [8] 何安平. 语料库语言学[J]. 中国外语, 2012, 9(5): 1, 19.
- [9] 曾建松, 李奇明. 区域国别经济文化互动语境下中国地方文化形象建构与接受——以斯里兰卡媒体报道中的湖南为例[J]. 外语电化教学, 2023(4): 99-106, 127.
- [10] 杨梅, 李杰. 区域国别学视域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国际化的认知话语分析[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6(1): 10-25.
- [11] 张道振, 罗嘉雯. 中医药对外传播中的形象建构——基于英语网络传媒语料库的考察[J]. 上海翻译, 2023(5): 24-30.
- [12] 毛春合. 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路径与启示——以新加坡为例[J]. 青海社会科学, 2018(3): 88-93.
- [13] 许红艳. 马来西亚国族建构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15(1): 15-22.
- [14] 吴芸. 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及族群问题研究[J]. 思想战线, 2014, 40(4): 44-47.
- [15] Nor, N.N.F.M. and Ghazali, S. (2022) Supporting the Elderly: The “Kenang Budi” Concept within the Malay Society in Malaysia. *Pertanika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30**, 1881-1893. <https://doi.org/10.47836/pjssh.30.4.21>